

麥田出版

台灣史與  
學子的

中國纏結

彭明輝◎著



盧建榮主編

歷史與文化叢書 16

# 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

彭明輝／著

麥田出版

歷史與文化叢書 16

## 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

作者：彭明輝  
主編：盧建榮  
責任編輯：鄧立言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 100 號 1 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 service@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字樓 504 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Sdn.Bhd.(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真：603-9056 2833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405 號  
初版一刷：2002 年 1 月

ISBN：957-469-914-5

售價：32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 自序

這本小書是在偶然機緣下決定出版的。

2001 年一個初秋的向晚，任教於政治大學法律系的摯友吳秀明兄與我在學校山上網球場打完球，坐在簡易水泥座休息椅上閒聊，談到這些年來的教學與研究，不免有許多感慨。秀明是我花蓮中學低一班的學弟，我服完預官役到政治大學讀碩士班時兩人同屆，我在歷史研究所，秀明讀法律研究所；我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母校任教的第三年，秀明獲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自德國返回政治大學任教；由於同來自花蓮和前後同學的機緣，兩人常相約到山上網球場打球，既是總角至交，亦是生活上相扶持的好友。我提到這些年寫的幾篇論文，以及因意外機緣而撰寫的中學教科書，秀明對我的一些論文興味盎然，建議我或許可以出一本論文集。我對自己的學術論文和文學創作向不經心，有些文章發表後就不再理會，抽印本和剪報散亂放置，加上搬了一次家，換了三間研究室，直到 2001 年 9 月搬到學校山上的研究室才稍較安定。俗話說“三搬當一燒”，何況搬了四次；搬到新研究室後，一些文稿雖已上架，仍不免零亂

雜沓。

從網球場下山，繞過校園回到位於網球場另端的山上研究室，在大樓附設的盥洗室洗過澡後，我把海布勒(Ingrid Haebler)演奏的莫差爾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第 10 號鋼琴奏鳴曲》(*Piano sonata 10 in C. K. 330*)放在唱盤上，當唱針輕輕滑過唱片溝紋時，莫差爾特永遠快樂的音符就彌漫了整個研究室；這是一首輕快的曲子，嚴格地說並不適合用來思考，不過我發現自己最近常聽這類令人愉悅而毋須費心思索的音樂，聽莫差爾特的時間顯然比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多很多。也許研究和教學工作太過枯索，我常常讓輕快愉悅的旋律，伴我度過研究室的枯索和寂寥。海布勒在二十世紀鋼琴演奏家中並非耀眼巨星，就像一個鄰家女孩，粗壯的身裁，村姑般的外形，殊不引人矚目，但我卻喜愛她演奏的莫差爾特鋼琴奏鳴曲全集，以及她和小提琴家謝霖(Henryk Szeryng)合作的莫差爾特小提琴奏鳴曲全集；或許正因為她的平凡，她是少數平穩安適度過一生的音樂家，而在她平凡的琴音中，我聽到了莫差爾特的古典樣式，一種更貼近我內心深處的聲音。

或許平凡正是我生活的寫照，每天讀書五小時，聽音樂三小時，每個禮拜上十二堂課，在研究室待六十小時，上山打三次網球，這就是我生活的節奏，有如四四拍子的慢板。音樂、運動和閱讀是我生活的基調，研究工作亦是尋常學術工作者的一般樣式，我喜愛這樣平淡的生活調子。在莫差爾特鋼琴奏鳴曲的陪伴下，我開始認真思考出一本論文集的可能性。於是在電腦目錄區找尋過去幾年所寫的研究論文，挑出性質相近的篇章略事整理，本書的雛形於焉初具。

蒐錄在本書中的論文，主題大抵環繞現代中國史學和當代臺灣史學的範疇，而臺灣史學發展又與現代中國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

係。在整理、修訂及改寫書中論文的過程中，思索再三，決定以《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為書名。書名的決定，主要依據書中各篇所論，均同時觀照海峽兩岸的史學發展，而使用“纏結”並沒有傾向或疏離的意味，而僅僅是一個中性的名詞，對政治敏感的朋友們，毋須費心猜測本書究竟傾向臺灣心或中國情之類的論題。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臺灣結／中國結成為政治上的敏感話題，本書不以“中國結”為名，用意即在避開學術之外的不必要聯想。在決定書名的過程中，亦曾考慮諸如“情結”或“情懷”之類的字眼，均因語意容易引發誤解或聯想而放棄，最後覺得“纏結”應是比較中性的字眼，或許可以避免一些非學術的聯想。

〈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是一個新的嘗試，由於個人在史學研究之外，自少年時代起長期從事散文創作，並且也是古典音樂愛好者，這篇論文同時運用了文學的“眾聲喧嘩”(raznorechie)，和音樂的“複音音樂”(polyphony)概念，試圖為五四史學找出一個可能的解釋。當時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會議室宣讀這篇論文時，我播放了顧爾德(Glenn Gould)彈奏的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二聲部創意曲》(15 *2part Inventions BWV 772 786*)，並用投影片打出曲譜，與會學者甚覺新鮮有趣，或許也為向來較為嚴肅的歷史學術會議添增一點好玩的氣氛。

〈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以考據與經世為主軸的討論(1919-1945)〉，論析五四到抗戰勝利期間史學工作者的研究論著，借用古典音樂的“主題與變奏”(Theme and Variations)，提出考據與經世的雙主題變奏和民族主義史學概念，上海復旦大學朱維錚教授在評論時認為將當時歷史學者的論著用民族主義史學加以貫穿，是一個饒富新意的見解。

〈臺灣地區的歷史研究機構與歷史系課程(1945-2000)〉和〈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1945-2000)〉是姊妹作，最初發表時以〈臺灣地區的歷史教學與研究(1945-1995)〉為題，其後將資料增補至 2000 年，並分開發表。撰寫這兩篇論文的最初動機，起於中國大陸與海外學者常詢及臺灣史學的研究概況，苦無可資說明的相關論著，於是將臺灣地區的歷史研究機構與歷史系課程做一簡介，方便國外學者對臺灣歷史研究與教學機構有一個鳥瞰式的認識。將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用量化的方式進行分析，亦出於同一想法。這篇論文沒有採用敘述的方式處理，主要是不想對各領域的研究成果做過多評駁，一方面耽心可能會有我個人的偏見，另一方面也可能引發不必要的誤解，讓數字說話或許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而論文嘗試採取文隨圖走的呈現方式，避免過去部分歷史論著圖文分離所造成的閱讀障礙。

〈臺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1945-2000)〉乃膺海德堡大學漢學系(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Germany)所主辦“現代中國史學與歷史思想研討會”(Workshop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inking, 2001. 5.23-27)所寫；緣於一九九〇年代臺灣地區的歷史課程改革引發主辦單位的興趣，希望我能向大會做一些報告。臺灣地區分別在 1993、1994、1995 年修訂的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和過去幾次修訂的課程標準有明顯差異，1993-1995 年所修訂的課程標準，歷史課程較此前各版課程標準更強調歷史學本身的意涵，且較具世界觀，不再以狹隘的民族主義史觀為中心，雖然國家立場的主體性和民族精神教育的內涵繼續存在(而且也必須存在)。1990 年代新修訂的課程標準，對中、小學的歷史教學產生極大衝激，其中國民中學“認識臺灣”教科書甚至引發學者

在媒體上的激烈論戰。這篇論文對 1945 年以後臺灣地區中、小學歷史教育大體做了一個鳥瞰式的論析，也略微討論了 2001 年開始實施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能力指標中有關歷史教育部分。由於我個人曾參與部分教科書的撰寫和課程規劃，有身歷其境的經驗，這篇論文對從事相關工作者或許有一些參考的價值。

蒐錄在本書中的篇章，具有與時代同脈搏的特色，而各篇論文的時代脈搏其實有兩個，一個是論述客體的時代脈搏，一個是作者所處的時代脈搏。法國年鑑學派開山祖師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說：「歷史是研究“在時間之流裡的人”的科學。」(History is the science of men in time)，這裡的“時間之流”係指研究客體的時間，同時也是研究者所處的時間，本書所錄篇章大抵均同時觀照這兩個“時間”，或許可以說明個人治學的思考邏輯。

值本書出版之際，我要特別感謝就讀花蓮中學時引發我對音樂產生興趣的郭子究老師，他開啓了我的音樂之門；我也要感謝引領我進入音樂殿堂的張繼高先生和戴洪軒先生，他們對音樂的鑑賞力和品味，影響了我對音樂的看法；而常與我切磋音樂賞析的樂友陳家帶兄，雖然彼此對音樂的看法時相逕庭，但他對演奏錄音版本的熟悉，省卻我許多摸索的時間；長輩和友朋論樂之樂，使我成為古典音樂愛好者，也間接觸動我用音樂概念討論史學的想法。

書中的電腦統計和繪圖，緣於就讀博士班時，已然而立之年的我，看到花甲之年的蘇雲峰老師勤習電腦，因而不敢怠惰，乃步趨老師之後塵；本書的電腦統計、繪圖和排版，就是在這種機緣下摸索出來的，在此謹向鼓勵我學習電腦的蘇雲峰老師敬致謝悃。

本書樣稿自電腦輸出後，愛妻吳翎君女士與摯友劉季倫兄曾分別校閱一過，減少書中的許多錯誤；“歷史與文化叢書”主編盧建榮



兄慨允收入本書，盛情雅意可感；麥田編輯部鄧立言先生費心處理編輯出版事宜，使本書能以典雅的面貌出現在讀者面前；在此一併致謝。

這本小書的寫作時間長達數年，在這段期間陪我一起工作的助理們極是辛苦，他們是林果顯、李清瑞、烏惟揚和蔡惠如，謝謝他們在資料蒐集和論文打印過程中的協助，使我的研究工作能順利進行，也讓我的研究室生活顯得不那麼形單影隻。

彭明輝 謹識 2001年10月6日 指南山下

# 目次

自序 .....	i
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 .....	1
一、引論 .....	1
二、儒學解體，諸說並起 .....	3
三、走出今古文問題的糾葛 .....	12
四、方法與方法論的迷思 .....	17
(一)梁啓超：抨舊史，迎新史 .....	21
(二)胡適：科學方法與實驗主義 .....	27
(三)何炳松：社會科學與史學的結合 .....	36
(四)顧頡剛：古史辨與史料學革命 .....	41
(五)傅斯年：史料與史學的對話 .....	47
(六)小結 .....	52
五、眾聲喧嘩：舊學與新知 .....	55
六、結論 .....	63

## 民族主義史學的興起：

以考據與經世為主軸的討論(1919-1945).....	67
一、引論.....	67
二、時代變局與史學動向.....	69
三、考據的幽靈借屍還魂.....	73
四、經世主題與民族主義史學.....	77
(一)從經世出發：柳詒徵的史學思想.....	78
(二)《東北史綱》：傅斯年從考據到經世的轉折.....	81
(三)文化週期論：雷海宗的期許.....	89
(四)民族文化史觀：錢穆的《國史大綱》.....	91
(五)內政與外患盛衰之連環性：陳寅恪的古典今情.....	95
(六)外患壓力下的史學：陳垣的宗教史研究.....	103
五、結論.....	109
臺灣地區的歷史研究機構與歷史系課程(1945-2000).....	113
一、引論.....	113
二、歷史研究機構.....	120
三、教學機構：大學歷史系所.....	124
四、歷史學系的新課程.....	134
五、結論.....	148
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	
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1945-2000).....	151
一、引論.....	151

二、區域與斷代.....	152
(一)由近及遠的本國斷代史研究.....	156
(二)臺灣史研究日受重視.....	161
(三)維持穩定比例的外國史研究.....	164
三、專史分類.....	165
四、各大學歷史研究所論文類型分析.....	173
五、結論.....	198
六、統計表.....	200
<b>臺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1945-2000) .....</b>	<b>207</b>
一、前言.....	207
二、從認識臺灣課程談起 .....	210
三、臺灣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及其演變.....	222
(一)小學的歷史課程與教學.....	224
(二)國(初)中的歷史課程與教學 .....	233
(三)高中的歷史課程與教學.....	241
(四)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中的歷史課程.....	253
四、結論.....	257
五、統計表.....	259
<b>徵引書目 .....</b>	<b>261</b>
一、中、日文部分.....	261
(一)專書.....	261
(二)論文.....	269

二、西文部分.....	279
三、網站.....	280
索引.....	283

# 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

## 一、引論

五四史學最突出的，並不在於完成了多少史學著作，或者解決了哪些歷史上的重大問題，而是方法與方法論的革新。處在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面臨舊學與新知並存、中學與西學同在的時代，我們很難明確指出何者為新，何者為舊，其中尤以史學為然。如果我們把古史辨運動視為史學之“新”，那麼，與古史辨運動緊密關連的晚清經今文學運動，是不是一種“舊”？如果我們把杜威實驗主義當成“新”，那麼，胡適用來印證杜威實驗主義的白話小說與先秦文獻，是否為一種“舊”？當胡適推動整理國故運動時，他心中所存想的究

---

\* 本文曾於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主辦之“五四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1999. 4. 24- 25)上宣讀，會中蒙張灝、張玉法教授提供寶貴意見，特此申致謝悃；撰寫期間，資料蒐集與文稿打印，由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林果顯、李清瑞協助。

竟是國故之“舊”，還是方法之“新”？五四史學即是在此種新瓶舊酒的弔詭中發展，加上中、西文化的交錯，形成諸說並起，甚或急弦嘈切的樣貌。

如果我們把所有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都歸功於五四時期，恐不免有點言過其實；如果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只有破壞而沒有建設，可能也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王國維曾指出，中國現代新史學的成立，端賴新史料的發現<sup>1</sup>，就史學而言，新史料的發現顯然是一個重大的建設，可以用來解決文獻材料和考古材料的問題。

五四時期的史學，對中國現代史學最具意義的，應是提出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在傳統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當中，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五四時期這般對方法與方法論如此興致盎然。就古史辨運動而言，以顧頡剛為中心的疑古陣營，固然高舉方法與方法論大旗，反對陣營的史地學報派，也同樣從方法與方法論的角度和疑古派進行論辯，並且雙方都認為自己所用的才是正確的方法<sup>2</sup>。類似情形也出現在胡適和李大釗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辯論上，論辯雙方甚至將“主義”當作一種方法。胡適以杜威實驗主義為其“科學方法”做張本<sup>3</sup>；李大釗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為馬克思唯物論，馬克

---

<sup>1</sup> 王國維認為，自古以來新學問的發展大都由於新發現，諸如孔壁古文、汲冢竹簡等，晚近發現之殷墟甲骨文與敦煌文書等大量資料，尤多於前代，使當代成為“發見時代”；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學衡》，45（上海，1925. 09；本文所據為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1年景印本）：6151-6163；所引在6151。

<sup>2</sup> 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83-92。

<sup>3</sup> 雖然有學者指出胡適的科學方法其實是一種科學主義；郭穎頤(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思主義在此次論辯中也變成了一種方法。

由於五四時期發生儒學解體<sup>4</sup>，造成諸說並起的現象，相關討論，大抵緊扣五四前夕中國知識分子迫切探求文化新契機的渴望<sup>5</sup>，並且希望突破張之洞“中體西用”的舊格局<sup>6</sup>，用新的眼光看待中學與西學的問題。

本文所擬討論者，為五四時期儒學解體、諸說並起的學術環境中，中國現代新史學究竟透過怎樣的方式建構？在建構的過程中，方法與方法論有何關鍵性的意義？

## 二、儒學解體，諸說並起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代背景極為複雜，學術界對此一運動的定義與解釋，亦莫衷一是，尤其當五四運動與政治、思想、文化、社會等各層面糾結難分時，學者們的解釋更是各出機杼，難有定論。五四時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急遽轉變的時代，雖然對於五四運動的看法言人人殊，但無論如何，其在學術思想上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

---

Press, 1965)；林毓生(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91-92.

<sup>4</sup> 林毓生教授以“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儒學普遍王朝的崩潰”，解釋五四時期的反儒學運動；林毓生(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85, 89, 91-92；林毓生，《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78-89。

<sup>5</sup>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10-11。

<sup>6</sup>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1-15。



研究五四運動的學者，對於影響現代中國極鉅的五四運動，一般都有兩種基本看法：(一)以五四事件為主的觀點，亦即認為五四僅係一學生的愛國運動；(二)以宏觀的眼光看待五四運動，亦即以整個學術思想的演變來加以探討；兩種說法均有支持者，亦各有其反對者<sup>7</sup>。

如將“五四”設定於政治層面或學生運動、群眾運動之範疇，則以五四事件代表“五四”可做一合理的解釋；至於大陸史學工作者對五四運動所做的擴大歷史解釋，將 1920 年代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等變化，均歸諸五四運動，則不免於是過度推論，甚或帶有特定的政治色彩<sup>8</sup>。

在政治層面與學生運動之外的“五四”，學術研究工作者慣以新文化運動為思考方向，其內容包含白話文運動與相關之各領域，以及學術思想的轉型等等。

五四時期的學術風氣<sup>9</sup>，大體可以從下列三個方向加以思考：

---

<sup>7</sup> 有關五四的定義，參考：周策縱(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60)；陳曾熹(Joseph T. C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The Making of a Soci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Leiden: 1972)；林一新，〈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0.6(臺北，1977.06): 14-22。。

<sup>8</sup> 這方面的著作甚多，較具代表性的如：胡繩武、金沖及，《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7-57。

<sup>9</sup> 周策縱教授以 1917-1921 為五四時期的上下限，其解釋為 1917 年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新思想和新文學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聲，具有關鍵性的意義；1921 年以後，新思潮運動的方向轉到政治上，不再是單純的思想運動，因而以此年為五四運動的下限；周策縱又將此一時間斷